

西醫與近代中國社會

賈學德*

西醫是不同於中國的傳統醫學（中醫）的一種西方醫學。近代以來，隨着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打開中國大門，西醫也大量進入中國。西醫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從地理位置而言，係由澳門這個狹小的區域向中國廣大的內地輻射；從結構層次上而言，由治病救人、創辦醫院、建立西醫學校的器物層次進而到改良近代社會制度，武裝推翻封建制度；從歷史進程而言，由鴉片戰爭時期的林則徐、洋務運動的李鴻章、戊戌變法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到辛亥革命的孫中山，無一例外地受到西醫的影響。

西方醫學簡稱西醫，是相對於中國傳統醫學（中醫）而言的，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所借用的一個重要的知識工具之一。西方傳教士中有些人本身就是醫生，來中國後，一邊傳教，一邊行醫，並在中國興辦醫院，開設醫學學校，在對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影響。

西方人體生理學解剖學在中國近代以前就傳入中國，這為西醫在中國近代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西醫是以古希臘、羅馬醫學為基礎而逐漸形成和發展的。西醫傳入中國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漢唐時代，但具有醫學的概念，並將西醫作為一種文化傳入性質看待而進入中國，大約開始於公元16世紀，即明末時期。16世紀以來，隨着布魯塞爾的維薩留斯（1514-1564）著《人體構造》一書開創了人體比較解剖學、英國人哈維（1578-1657）發現血液循環，人體構造的秘密被打開之後，建築在此科學成就之基礎上的西醫就有了飛躍的發展，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播西醫就是以人體構造和解剖學為基礎的。利瑪竇著《西國記法》一書，最早介紹腦的位置及功用：“記含之室，在腦囊，蓋顛凶後枕骨下，為記含之室。”這對於明朝以前中國人不清楚腦的記憶作用而以為記憶是由心主使來說無疑是全新的

東西，並很快為中國人所接受。如明崇禎朝進士金聲曾說：“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兒小善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老也。”⁽¹⁾傳教士艾儒略著《性學粗述》介紹了西方早期的人體生理方面的知識。如書中作者稱眼為“淚之官”，“視之目則有三者，目之前後上下有薄膜層，包護眸子，如城廓然。腦內有二筋通目，而授之覺之氣，與其能視之力。其瞳清如水晶，不染色，故能均辨萬色。”方豪先生稱此皆為古時中國學人聞所未聞。⁽²⁾

近代以前，清朝的康熙帝對西方的數學、文字、地理等所謂的西學很感興趣。西醫應屬西學的一種，西醫也受康熙帝的青睞。但與西方數學、文字、地理等不同，康熙帝對西醫的愛好很可能與康熙帝本人對西醫的“親自感受”——接受西醫的治療，使其久治不癒的病癥得以治癒有密切關係。康熙朝來華的傳教醫師羅德先⁽³⁾醫術高明。他曾兩次挽救了康熙帝的性命：一次是心臟病，“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臟弱，跳得很快，臥病幾死。羅德先進藥（一種藥酒）痊癒，遂榮任宮廷御醫。”一次是割去康熙上唇的腫瘤，由此引起康熙帝對羅德先及其他傳教醫師的信任。連羅德先在內，共有鮑仲義⁽⁴⁾、樊繼訓⁽⁵⁾、羅懷忠⁽⁶⁾、安泰⁽⁷⁾五人是康熙朝來華的傳教醫師，皆任職太

* 賈學德，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現任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系講師。

醫院。除為皇帝、王公大臣看病外，還行醫舍藥於窮人，康熙帝任用西方傳教士醫生作為內廷御醫，促進了西醫的傳播，擴大了西醫在中國的影響。但這種局面不久被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所打破，清政府從對傳教士嚴加取締到禁絕西學，也使西醫的傳入中國暫告一個段落。

1840年的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國家的洋槍洋炮打開了封閉已久的中國大門。隨着西方經濟文化的大量侵入，西醫也隨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康熙朝時期西醫大多為皇帝大臣看病，轉向為西醫下移，面向中國社會的各階層，開始融入中國社會，進而對醫學以外的一些中國社會問題也有一定的影響。伴隨着船堅炮利而來的西醫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浸入中國社會。

西醫最早由澳門傳入，並以澳門為基地。大多數傳教醫生在澳門接受語言的、西醫方面的培訓或適應，再進入中國內地開始其傳教行醫、設立醫院、建立西醫學校、開設西醫藥店等一系列的活動。澳門成為西醫由西歐進入中國內地之門。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傳教行醫。1569年（隆慶三年），澳門開辦了三所醫院：“醫人廟”，即拉法醫院，澳門華人名之曰白馬行醫院；“發瘋院”，即辣匝祿麻瘋院，又名望德堂；“支糧廟”，即仁慈堂，倣羅馬仁慈會開設，救助貧弱病殘，兼收棄嬰孤兒。以上三所醫院為西醫傳入中國之始。

作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之一的西醫最早由澳門傳入中國有其地理位置的原因和歷史的原因。澳門位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一個三面環水一面連接陸地的半島。澳門毗鄰香港，面臨南海，背靠祖國廣袤的陸地。澳門半島三面臨海，海外航行十分方便，西行可到暹羅（今泰國）、緬甸和印度的果阿，過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又可到達歐洲；南行可到馬尼拉、雅加達等東南亞各國港口，橫過太平洋就能直達美洲諸國。從南面的伶仃洋放洋出海，裝卸貨物，就近泊岸，都具有十分優越的條件。

澳門西岸的濠江為內港所在，與珠江三角洲的河道相連接，船舶溯水而上，可到江門，佛山、廣

州等城市，也可到中山、新會、順德、南海、番禺等地；如果東北行，從澳門出發，又能直達汕頭、廈門、寧波、上海、青島、天津和大連等港口，也能直達日本的長崎。明中葉前，澳門這一地名尚未出現，半島的北部叫望廈或者旺廈。南部有個帶海口特產的名字蠔鏡。以後還有其它的稱呼，如蠔鏡澳或濠鏡澳、香山澳、濠江、濠海、蓮島等。

澳門早已是中國的一個泊口，是外國商船過往停泊之所。當時像澳門這樣的泊口在珠江口外還很多，如新寧的廣海、望峒、奇潭，香山的浪白、十字門、濠鏡即澳門，東莞的虎頭門、屯門、雞棲等。葡萄牙特使皮來資在他於1514年寫成的《東方記》中就有這樣的描述：“除廣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為濠鏡，陸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

明末清初，中國厲行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封建朝廷聽信“倭寇”之禍起於沿海市舶的讒言，“罷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隨着閉關鎖國政策的進一步施行，廣東市舶司遷出廣州後，幾經遷移，1535年，廣東官府把廣東市舶司移至澳門，使澳門正式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港口，也是全國唯一的通商口岸。中國古代稱外國商船為市舶，市舶司是負責管理對外貿易事務的機構，這個機構的長官為市舶使。市舶使為朝廷命官。澳門港的開放，為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創造了便利的條件。1553年至1557年，葡萄牙人通過賄賂手段，取得了明朝地方官員的允許，開始進入澳門居住，進行通商貿易。這更方便了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尤其是葡萄牙的傳教士到中國來。

葡萄牙耶穌會士伯來篤是明朝官方批准登陸的第一位西方傳教士。他同另一位耶穌會士公匠勒最早開始在澳門招收華人為天主教徒，頗有成效。到1563年，澳門至少有8位耶穌會士，1565年澳門已經有5,000名以上教徒。耶穌會士們還建立了第一所教堂，以及一座附屬於教堂的小修道院，作為赴日本的傳教士的客房。

1568年，葡萄牙人卡內羅主教奉羅馬教皇之命，由印度抵達澳門建立了教署，自任主持。根據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二世的劃分，該主教轄區包括廣

東、廣西兩省和海南島。卡內羅奉行慈善傳教的方針，宣揚欲使“饑者能得其飽，哭者能止其淚，傷者得敷藥，渴者能得救助”，⁽⁸⁾而實現卡內羅慈善傳教方針的最好形式或最好手段是創辦醫院，用西醫為病人去除痛苦。卡內羅於1569年在澳門建立了聖拉法艾爾醫院及其附屬的麻風病院和慈善堂。卡內羅是第一位將西醫傳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其後又有大批的傳教士將西醫帶到中國來。

除了西方傳教醫生在澳門最早設立西醫醫院外，在澳門最早接種牛痘也是西醫傳入中國的標誌性技術。本來免疫學最早是在中國開始的。天花人痘接種是中國醫學的重大發明。據清代學者俞茂鑑在《痘科全鏡賦集解》（1927）中說，明隆慶年間（1567-1572）甯國府太縣（今安徽太平縣）開始接種並傳向全國。據此可認為，中國的人痘接種發明應當在16世紀下半葉。這項發明技術約百年後開始傳往國外，並由英國醫生琴納將其改進發展為牛痘接種技術。嘉慶十年（1805）英國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在澳門試種牛痘取得成功。這是牛痘接種技術傳入中國的開始。皮爾遜還將牛痘接種技術傳授給中國人，以便增加牛痘接種的人手，使更多中國人掌握這項技術。因為牛痘接種方法簡便和效果顯著，所以很快在中國傳播開來，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從中國的人痘接種技術由中國傳到國外，再由國外的牛痘接種技術經過澳門傳回到中國的循環過程中蘊含了中西醫合璧，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與疾病作頑強鬥爭的成果。

近代以來來華的西方傳教醫師及其主要活動：郭雷樞（1796-1879），英國人，東印度公司派駐中國的傳教士，精眼科，1827年在澳門設立眼科診所，1838年與伯駕等在廣州成立教士醫學會，任會長四十餘年，倡導傳教行醫。

合信（1816-1833），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的女婿，醫學碩士，皇家外科學院會員，1839年來華，在澳門傳教行醫，任過倫敦佈道會香港醫院院長，寫過許多有關解剖學、內科、接生和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其翻譯的《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為最早一批介紹西方醫學的著

作，對中國醫學有批判性研究，並試圖實現中西醫結合。

嘉約翰（1824-1901），美國北京長老會教士、牧師，醫科大學畢業，1853年來華，在廣州行醫傳教，1859年在廣州設立博醫局，後改名為博濟醫院，任院長長達四十四年。他還附設醫塾，廣招學徒，1879年招收女性習醫。1887年在香港開辦南華醫學校（孫中山即為該校學生），為中國培養了一百五十餘名西醫人材，1898年在廣州創辦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院，翻譯、著述較多，像《西醫略釋》、《眼科撮要》、《包紮新法》等，全面介紹西方醫學。在華曾為中華博醫學會會長，其創辦的《博醫學報》為我國最早的西醫學術刊物。

伯駕（1804-1889），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美國耶魯大學畢業，醫學博士，是第一個赴華的美國傳教醫生，1834年來華，來華前曾向海外佈道會表示：“我可用我的一生給百萬中國人的肉身需要施醫給藥，雖然我有理由重視解除肉身的痛苦這個願望。可是，千百年之後，肉身的痛苦依然如故，效果甚微。倘若能與靈魂聯繫起來，那就是萬世不易的重要性。中國的需要是巨大的，……我最大的榮譽是，我到中國去是作為耶穌教徒的傳教士。”⁽⁹⁾看來，伯駕是懷著救社會甚於救人的願望來到中國的，不可能不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影響。伯駕在廣州傳教行醫，創辦眼科醫院，精外科手術，在中國實施過四肢截斷、摘除腫瘤、取膀胱結石等手術，較早地將剛發明的哥羅仿麻醉劑傳入我國。

司督閣（1855-1936），英國青年基督教會佛來芒分會牧師，愛丁堡醫學院畢業，醫學博士，1833年來華，在我國東北地區傳教，歷四十年，1923年回國，在瀋陽創立盛京施醫院和奉天醫科大學，最先將西醫傳入東北，開創了西醫院機構、分科及西醫教育的先河。

文惠廉（1811-1864），美國聖公會傳教士，醫學院畢業，1840年來華，在廈門、上海傳教行醫。

文恆理（1805-1916），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80年在上海創辦同仁醫院，自任院長。

博恆理（1875-1916），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72年來華，在天津傳教行醫。

羅嘉禮（1875-1920），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1903年來華，在山東濰縣傳教行醫，後任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教授。

柯德文（1871-1952），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1899年來華，在安徽傳教行醫。

隨着傳教醫師的進入中國，西方醫學的醫院制度、西醫的科學分類方法、西醫的治療方法、西藥的製造等也傳到中國來。

醫院制度由傳教醫師傳到中國來，使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以家為單位醫療護理的醫療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教醫師艾儒略在《職方外紀》卷二中談及醫院的設置：“又有醫院，大城多數十所，有中下院處中下人；有大人院處貴人，凡貴人若羈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則入此院。院倍於常屋，所需藥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日與病者診視，復有衾帷幔之屬，調護看守之人，病癒而去。”⁽¹⁰⁾對醫院中就職的醫學人材的選拔錄用也有一套成熟可循的制度：即在醫學院學完專業課和文化課後要實習，經實習合格才有行醫的資格。建立的醫院或診所所有：1843年美國人赫伯恩在廣州開辦診所；1844年英國傳教士醫生洛克哈德在上海建立醫院；1845年美國浸禮會委任麥高恩在寧波開辦醫院；1848年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在廣州開辦金利埠醫院，1859年在廣州創辦的博濟醫院一直延續到1949年，是在華歷時最久的醫院；1865年英國長老會在汕頭建立高德醫院；1881年英國聖公會在杭州建立廣濟醫院；1892年美國教會聯合創辦南京鼓樓醫院。

西醫的科目分類也傳到中國。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安文思（1609-1677）等人在近代以前為幫助康熙帝瞭解西方風情曾編著《西方要記》。書中對西醫分科有如此敘述：“醫分內科、外科，有專以草木為藥者，亦有兼用金石鍛煉之藥者。其看病診脈之外，以玻璃瓶盛溺水，驗其色，識其病根。”⁽¹¹⁾可見現今醫療通行的驗尿查病法，早在三百年前就由西方傳教士介紹到我國。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設立的較大醫院裡一般都有內科、外

科、婦科、小兒科、眼科的分類與治療。屬於以上各病的疾病如：內熱、頭痛、肝炎（目黃）、痔瘡、乳瘤、梅毒、月經閉塞、小兒種牛痘、遠視、近視等都有涉及與治療。

生產西藥產品。隨着西洋醫學在中國各地的廣泛應用，對西藥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加，於是一些外國藥商和傳教士醫生相繼在中國設立西藥製藥廠，生產西藥。1909年英國人施德之在上海開設德之藥廠，這是外商在華開設的第一家西藥製藥廠，成為上海當時規模最大的西藥製藥廠。初期所建立的製藥廠設備較為簡陋，祇能從事一些常用的基礎藥品的生產，而這些藥品在當時國內乃至東南亞地區頗受歡迎。如科發藥廠生產的沃古林眼藥水和白松糖漿、屈臣氏藥房監製的寶塔糖等。在生產西藥產品之前，許多外國藥商看中了中國這塊西藥銷售市場，紛紛來華開設西藥店。1850年英國藥師洛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西藥房上海藥房；1853年英商勞惠霖在上海開辦老德記藥房；1860年英商建立屈臣氏藥房；1865年英國醫生撒敦建立大英藥房；1866年德國醫生開辦科發藥房；1887年法商開辦良濟藥房。

近代以來在中國就診西醫的病人幾乎包括了社會各階層，上至達官貴人，下到平民百姓。19世紀40年代與外國簽訂條約的兩廣總督耆英就曾是傳教醫師伯駕的病人。伯駕曾為耆英患的皮膚病配藥治療，使耆英的病情明顯好轉，致使耆英對西醫很好感，手書條幅“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贈給伯駕，深表謝意。請伯駕治病的人為數不少，清政府官員請傳教醫師看病在當時不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赴廣州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就曾派替身到伯駕處取回幾隻疝氣袋，用了以後病情明顯好轉。⁽¹²⁾此事記載於《中國叢報》上：“疝病 林則徐 欽差大臣 前湖廣總督 現任兩廣總督從醫學上說該病案沒有值得可引起興趣的地方。事實上，這位病人也從來沒有見到過，但是我想，對於這樣一位著名的人物，他的行為是中英這樣兩個大國間破裂的近因。……他第一次求助於本院是在7月間，不是為了看病，而是要我翻譯滑達爾著的《各

國律例》一書中的若干段落，是由高級行商送來的。摘譯的段落包括戰事及其附帶的敵對措施，如封鎖、禁運等等，是用毛筆寫的。他還要我對有關鴉片的情況提出事實的陳述，並開列出鴉片受害者的一般性藥方。我用漢字寫了答覆。”“他通過南海知縣和誥官向我索取治療他疝病的藥品，大約是在與他第一次派人來找我的相同的時候。我用中文向他詳細說明了這種病的性質，畫了一幅病變部位的解剖圖，還說明了歐洲人治療這種病的方法，然後告訴他，為了減輕症狀，必須帶上一種托帶。”“據報告，疝帶送去給欽差大臣之後，健康狀況良好，祇有當他咳嗽時肚子上的東西較易滑落。從他所說的症狀來看，他似乎還有氣喘，我給他送去了一些藥。為了向我道謝，他送來了水果等禮物。還要附帶提一下，欽差大臣特別垂詢了有關眼科醫局的情況，他被正確地告知了這所醫局的情況，說明這所醫局是同在別國的醫局相似的。他聽了之後表示贊許。”⁽¹³⁾

1880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妻子生病，請中醫久治無效，不得已請當時在天津的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馬根濟治療，很快痊癒。李鴻章大為感激，資助馬根濟在天津開了一所小型醫院。傳教醫師馬尚德曾為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側室魏寶珍治過病，為譚繼洵的孫媳尤氏做過乳房切除手術，向譚繼洵的孫子譚傳贊提供過戒除鴉片的方子。1895年，譚繼洵與馬尚德見面後，譚家人有病就把馬尚德請來，因此，馬尚德成了譚家的“家庭醫生”。1877年，那位日後參與鎮壓戊戌變法權傾一時的榮祿腰部生瘤，先後請了數十名中醫診治，未見好轉，反而日見沉重，患處腐潰方圓七八寸，洞出三十餘孔，痛苦不堪，萬般無奈。他找了時在北京的傳教醫師德貞。德貞為他做了兩次麻醉切除手術，患處日見起色，兩個月便平復痊癒。榮祿大為歎服，稱贊德貞醫術“精妙絕倫”，並為德貞編的醫書《全體通考》作序。

西醫也同樣受到中國平民百姓的熱烈歡迎：“自中國通商以後，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藥者就之，常常有

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富貴貧賤，皆有喜西藥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而就醫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¹⁴⁾西醫院門口也熱鬧非凡：“看一看在醫院大門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診隊伍，看一看每天清晨從四面八方擁來的車馬轎子，看一看那些官員、侍從、馬伕、轎伕，是如何把整條街擠得水泄不通的。人們把小孩舉過頭頂，否則小孩就會窒息、擠傷。”⁽¹⁵⁾據統計，僅上海的仁濟、體仁、同仁三所教會醫院，在19世紀70年代，每年診治病人，已多至十萬人次。

西醫在中國傳播的同時，由解除人的身體的病痛，進而引起一些親身經歷西醫的人心靈的震撼，更進而發展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思考、批判。

1844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寫進了有關傳教的內容，這與兩廣總督耆英接受西醫的治療，治療好耆英的皮膚病不無關係。

赴廣州查禁鴉片志在根絕煙患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慕名伯駕醫術高明、期望伯駕為自己解除疝病之情的同時，曾向傳教醫師伯駕討教西方治鴉片癮特效藥，可見林則徐已迫切地想試圖通過解除人身體痛苦的西醫來摘掉寄生於近代社會機體的鴉片毒瘤。伯駕雖未給出治療鴉片癮的特效藥，卻對當時鴉片引起的社會問題、中英關係問題、近代中國社會問題在信中向林則徐談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議：中國與英美法等各國訂立一項“友好的條約”，以求長期和睦相處，避開戰爭，採取和平的解決辦法。伯駕的建議雖未被採納，但西方傳教醫師對中國近代社會施加影響的慾望可見一斑。親身感受過西醫之妙的李鴻章積極幫助傳教醫師馬根濟創辦西醫學校，並倡導發展軍隊西醫：“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而救治傷科直起沉痾，西醫尤獨擅專長，其學以考求經絡辨別藥性為始基，以察臟腑之運行、練臨癘之理法為進步，其究以洞內科之精微、平諸家之同異為極功，非專門名家歷經考試，該國家未能給憑診治。”⁽¹⁶⁾看來李鴻章也極想通過西醫來改善軍隊，增強軍隊的戰鬥力。

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因其家鄉香山縣毗鄰澳門，他青年時期曾多次到澳門遊歷，以後還在澳門居住過多年，因此對西醫尤其是對澳門的西醫有所瞭解。他寫過一本《中外衛生要旨》（1890年著成），依據西醫學理論指出：“欲求治未病之方，先絕其致病之源。絕病源有六理，即興、熱、空氣、水、飲食、運動。”實際上這是一部經由公共衛生宣傳達到社會改良，最終達到改造社會的政治性書籍。

盛京醫院的建立者傳教醫師司督閣，在為政府官員及他們的親屬治病後，受到當時奉天顯赫人物寶貴將軍、總督赴爾巽、徐世昌、唐紹儀及後來軍閥張作霖的交口稱贊和有力支持，這對司督閣的傳教行醫活動有很大的幫助。看來傳教醫師司督閣已被當地社會所接納，開始融進當地社會。

康有為之所以成為學習西方的代表人物，與其治病經驗有一定的因果聯繫。1885年春，康有為患病，頭部暴痛如裂，自云“群醫束手無法，惟裏頭行吟於室外，數月不出”，祇好“檢視書籍，從容待死”。一個偶然的機會，“得西醫書讀之”，買了西藥，依方試服，竟漸漸痊癒。⁽¹⁷⁾康有為由試西藥醫治其身，進而觸動其心，促使其對中國傳統東西方近代思想的對比思考，走上維新變革中國的道路。1888年，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帝失敗後，深感民智未開，人材匱乏，從而創立萬木草堂，決心從教育入手，培養維新志士。在萬木草堂，康有為購置了當時翻譯過來的一些西方歷史、法律、地理、社會和數學、物理學、醫學、生物學、天文學、電子、機械學等自然科學圖書。從以上的書目可以看出康有為的良苦用心：從萬木草堂走出去改造近代中國社會的維新人材的知識結構中應具備西醫知識。

1894-1895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戰爭以中國的戰敗、對日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結束。中國人民感覺到了亡國滅種的關鍵時刻，改革的呼聲進一步高漲，尤其是廣大智識分子更不滿足於李鴻章等人“中體西用”式的祇學西方的船堅炮利而不學習西方制度的“洋務運動”，要求改革中國的

政治制度。康有為、梁啟超等在京應試的舉人聯合上書，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上書主張中國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進行全面改革，其中也有醫學的改革，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西醫技術與知識。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梁啟超在上海《時務報》發表了關於醫學改良的意見，稱：“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果，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免疫，而講割紮……”⁽¹⁸⁾梁啟超宣傳英國的醫學政策，宣傳英國的醫學改革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肇始，從而將西醫從一個治病救人的層次一下子拔高到社會改造的高度。戊戌變法的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曾隨美國醫生嘉約翰習醫三年，對西醫有一定的研究，並將西醫與當時的維新變法與社會變革結合起來。康廣仁後來在澳門主辦《知新報》時，闢有專欄介紹西醫。1897年11月11日該報發表劉楨麟寫的〈富強始於衛生論〉云：“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見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知新報》第三十九冊）

由於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不斷鼓動，1898年，清光緒帝下諭詔變法維新。醫學方面的改革也是其主要內容之一：“醫學一門關係至重，極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雖然連同醫學改革在內的維新變法失敗了，但西醫確實曾經引起過力主變法圖強的光緒帝的注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康梁等資產階級改良派改造中國的希望破滅後，改造中國的歷史重任落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肩上。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人物孫中山勇敢地擎起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國的大旗。而孫中山步入革命的征程，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卻與西醫有密切的關聯。

孫中山，1866年11月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享村一個農民的家庭。翠享村同澳門同屬香山縣管轄，離澳門祇有35公里。孫中山的父親在澳門一家鞋店當鞋匠，哥哥孫眉由澳門搭船前往美國檀香山謀生。孫中山十二歲時也是隨母親經澳門搭船前往檀香山。由於孫中山出生地的地緣關係，由於早年便接觸中西合璧的澳門，使孫中山少年時便對西方、西學有一個朦朧的認識。後來，孫中山回憶自己少年時的情況曾寫道：“初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遂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青年時的孫中山終於實現了自己的“慕西學之心”，開始接觸西學中的西醫。1887年孫中山進入香港西醫書院學習西醫。西醫書院本是雅麗氏醫院的附屬醫學院。雅麗氏醫院是由香港著名人士何啟創辦的，是香港第一家教會醫院。何啟，廣東南海縣人，生於香港，青年時期留學英國，攻讀醫學和法律，先後獲得醫學博士和英國大律師資格。何啟認為要擴大救死扶傷的崇高事業，關鍵是要造就更多掌握現代西醫知識的人材，乃建議於醫院內創辦西醫書院。何啟是一個精通西學並力主改革的憂國憂民之士，曾著文揭露和抨擊清朝政府“政治不修，風俗頹靡”的腐朽狀況，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主權在民的思想。孫中山進入西醫書院學習之時正是何啟為改革大聲疾呼之時。西醫書院的規模不大，師生之間極易交往。何啟既是香港西醫書院的創始人，又是法醫學、生理學教師，孫中山很快與何啟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孫中山深受何啟“主權在民”的論說及銳意改革的思想影響。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中國近代著名的早期維新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也對他有很大影響。鄭觀應與孫中山是同鄉，在《盛世危言》一書中他提出“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提出中國要與西方爭強，就要學習西學，特別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鄭觀應於1886-1890年間曾“賦閑於澳門”。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每逢寒暑假都要經過澳門返回翠亨村家鄉度假。在澳門期間，孫中山與鄭觀應經常談論革新政治、醉心西學的看法。孫中山從鄭觀應

處也深受啟發。1894年，也就是孫中山從香港畢業後的第三年，鄭觀應曾函請洋務派官員向當時的朝廷重臣李鴻章推薦孫中山，極為贊賞孫中山的學識與抱負。孫中山與鄭觀應，這兩個中國傑出的思想家，互相推崇，互相激勵，終於奠定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創造了中國歷史的輝煌。

香港西醫書院為五年制的醫科學校，其課程設置為植物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學、臨床診治、產科、婦科、病理學、外科學、法醫學、公共衛生等自然科學學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實習才能掌握的西學知識。這種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着重實踐與理智的現代教育一方面使孫中山較完全地接受與封建思想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另一方面又鍛煉了孫中山的注重實踐的精神。

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以各科成績最優名列第一名畢業，獲醫科碩士學位。畢業後，孫中山在澳門的鏡湖醫院出任西藥局首任義務醫席，成為澳門華人醫院的第一位華人西醫。至今澳門鏡湖醫院的門口，仍站立着穿工作服掛聽診器的“孫醫生”塑像。孫中山以自己精湛的醫術準確地診治各種疾病，例如難產、中毒，做外科手術及整形手術。孫中山還開始給澳門的華人兒童接種牛痘，並將此項技術傳向國內。孫中山在澳門行醫不到三個月便名聲鵲起，醫名遠揚。另外孫中山還經常為付不起醫藥費的人免費贈醫治病，免費提供藥品，表現了他的高尚醫德。

孫中山雖然是一個極其稱職的醫生，靠他的醫術也能保證衣食無愁，甚至榮華富貴。但孫中山在行醫的過程中深感他要救治的不僅僅是人的軀體，更是災難深重的中國社會。因此，孫中山在澳門一邊行醫一邊進行革命活動，1893年7月與澳門土生葡人費爾南德斯合作在廣州創辦《鏡海叢報》，發表了不少革命言論。1894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主綱領，明確提出推翻清政府。至此，“醫生”孫中山也就開始成為一個醫治舊中國的職業革命家。由此，澳門也就成為一塊孕育孫中山從學生而成為醫生進而成為職業革命家的“蓮花寶地”。

與中國的傳統醫學中醫不同的西醫，從近代以來大量進入中國，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也日益加強。從地理位置來看，由早期局限於澳門狹小地域的西醫而至後期西醫傳向中國內地，傳向中國的許多地方，並在中國內地的許多地方與中國幾千年來的中醫並駕齊驅，其傳播速度之迅捷，地域之廣泛，是近代以前的中國所無法比擬的；從層次結構上看，西醫由開始治病救人、設立醫院、開辦藥店、建立學校等器物層次方面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進而轉變為學習西方的社會制度、革除中國的舊制度、甚而暴力摧毀中國封建制度的變革。從近代中國社會的進程來看，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走向進程中，近代中國社會風口浪尖上的歷史人物幾乎無一不受西醫的影響。例如，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洋務運動中的李鴻章，戊戌變法中的康有為、梁啟超，更使人驚歎不已的是曾經手拿手術刀身佩聽診器的著名西醫孫中山，聯合他的革命黨人，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將一個存在了兩千年的封建中國，經過辛亥革命這麼個大“手術”過程而徹底被解剖被瓦解，古老的中國獲得了新生，這恐怕也可稱其為是西醫改變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先例。

作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傳播到中國的附屬品西醫，曾被毛澤東指為西方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政策”的一部分。毛澤東於1939年12月寫作的《中國革命和中產共產黨》中列舉了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十種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通過“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班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¹⁸⁾“文化侵略政策”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它的合理性在於，近代傳教運動確實與西方殖民主義擴張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傳教士在華活動在一定時期確實產生了有利西方政治和經濟侵略的客觀效果，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在19世紀西方列強多次利用教案向中國提出進一步的特權要求，二是傳教士主要出於佈道需要而對中國社會進行的調查為商人和政治家所利用；三是少數傳教士為西方在華的政治侵略行為進

行辯護；四是一些保守的傳教士反對中國青年學生參與和從事民族主義運動；五是不能排除教會學校的確培養了一些所謂的“崇洋媚外”者。“文化侵略政策”也有其局限性，傳教運動所涉及的範圍相當複雜，所謂有利於西方政治和經濟的“文化侵略政策”不是其全部內容。傳教運動一是將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完整地傳入中國，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建立了中國的本色教會，這是近代來華傳教士對中國社會的獨特貢獻；二是通過從事範圍廣泛的社會、文化與教育、醫學活動，傳播了現代化的西方文化，大體上對19世紀中國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推動了中國醫學事業的發展。

【註】

- (1) 維康：《中國醫學史》，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年，頁446。
- (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196，中華書局1973年版。
- (3) 羅德先(1645-1715)，字慎齋，德國籍耶穌會士，1699年來華。
- (4) 鮑仲義(1680-1718)，字質庵，意大利籍耶穌會士，1692年來華。
- (5) 樊繼訓(1644-1703)，字述善，法國人，耶穌會士，1692年來華。
- (6) 羅懷忠(1679-1747)，字了敬，意大利籍耶穌會士，1700年來華。
- (7) 安泰(1689-1758)，字自得，法國人，耶穌會士，1700年來華。
- (8)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頁108、131。
- (9) 嘉惠霖等：《博濟醫院百年史》，頁28-29。
- (10) 《職方外紀校釋》，中華書局，1996年，頁71。
- (11) 轉引自趙璞珊：〈西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歷史研究》，1980年三期，頁40。
- (12) 朱維鈺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13) 《中國叢報》，1840年4月，頁624-639。
- (14) 《申報》，1877年11月22日。
- (15) 喬那森·斯潘塞：《改變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 (16)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七十八，頁31-32。
- (17) 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華書局，1992。
- (18) 梁啟超〈醫學善會序〉，見《戊戌變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4冊，頁449。
- (19)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29-630。